

闲话红楼

探春做事，宝钗做人

刘晓蕾

我有一门通识课《红楼梦漫谈》，总有学生说：老师，宝钗是人生赢家，像她那样才能成功嘛！

真的吗？今天不说宝黛，来谈宝钗和探春。大观园首次文青聚会，海棠诗社，湘云却落单了。她兴致勃勃地补写了几首诗，意犹未尽，声音当东道主再起一次诗社，大家纷纷叫好。

宝钗晚间便邀请湘云去蘅芜苑同住，问道：云妹妹，作东起诗社这事嘛，虽然是玩，但也要瞻前顾后，不要得罪了人，才好。况且，作东需要钱，你，从哪里弄钱？

一句话提醒了湘云，她不禁踌躇起来。

湘云父母早亡，一直跟叔叔生活，身不由己，手头并不宽裕，宝钗知道。她接着说：我有个好主意。我家当铺有个伙计，送来几斤上好螃蟹。前日姨娘说要请老太太，不如这次就请大家吃螃蟹。等大家吃完散了场，咱们再作诗。

湘云感激不尽。螃蟹大获成功。贾母还夸宝钗：我就知道这孩子稳重周到，办事靠谱。

诗社本来是小型 party 小众活动，简单随意。海棠社就这样，探春一纸邀约，众人高兴，起个雅号，脱掉世俗身份，大家都是诗人。这才是乘兴而起，兴尽而返，颇有王子猷雪夜访戴之风。

诗社乃探春发起，她写：“凤庭月榭，惜未宴集诗人；杏帘溪桃，或可醉飞吟盏。孰谓莲社之雄才，独许须眉；直以东山之雅会，让余脂粉。”如此年华，这般美景，岂可任其辜负！

大观园文青扎堆。黛玉孤独而自由，是真正的诗人，相比之下，探春是非典型文青。虽然她诗才并不出众，但她懂得诗存在的重要性：诗是自我救赎，是超越现实的功利的世界，抵达审美、自由和灵魂的途径。

但宝钗一心想的却是：别得罪人！她的世界，总是人际关系。

探春不一样。她去赖大家做客，发现他家花园的花草可以卖钱！一年下来竟有 200 两银子！探春的小宇宙开始爆发：大观园可要大一倍都不止，那就得卖 400 两银子了。

事实上，贾府此时的日子愈发艰难：元春省亲，银子花得像流水；日常迎来送往，满府人丁，节日寿诞……通通要花钱。冷子兴开篇就八卦道：贾府外面的架子还在，内囊早就尽上来了。而从 70 回始，贾府越发露出那没落的光景：贾璉惦记老太太收藏的体己，求鸳鸯偷出来卖钱；尤氏在贾母处吃饭，却只有下人吃的白糯米饭了；管家林之孝建议裁人……

黛玉也看出来，对宝玉说：你们家挣得少，花得多，早晚后手不接啊。可惜，阖府上下，大多都沉睡不醒，有的则装睡。

秦可卿临死前给王熙凤托梦警告：这不过是瞬息繁华，要记得盛筵必散的道理。可惜，凤姐在权力和欲望的裹挟下，难以自拔。

探春是最清醒的。凤姐小恙，王夫人派她、李纨和宝钗当临时管家，她一上任便抓住几件事，砍掉重复不必要的开支，再考虑增收，正是开源节流。

按探春的设计，先选几个对园林花木在行的，把园子承包给她们，任她们管理。到年底结算，减掉人工和其它花费，再交到账上。

宝钗呢，不置可否。她有一脑门的顾虑：一上来就谈

钱，太俗。何况，这样算计小钱，岂不伤了大家族的体面？所谓体面，王夫人也很在意，眼看着后手不接，日子艰难，她还一味怀想当年黛玉母亲的风光。

这种论调我们并不陌生。大凡儒家的读书人，多重义轻利，一说到钱，就觉得俗。洁癖到极致，连钱都不能说，要说“阿堵物”。

其实，宝钗家里是皇商，开着当铺，熟悉这些俗务，但也羞于谈利，可见宝钗做人做事都很儒家。宝钗随后祭出了朱熹这面大旗，说朱子的书里什么都有，探春啊，在圣人面前，你这套弱爆了。

探春不同意：朱子那些话，不过是她人自励，虚比浮词。意思是，这些人不过就是说说罢了，不是真的，他们做不来的。

宝钗批评道：朱子都有虚比浮词？那可句句真理。你才办了两件实事，就利欲熏心，连朱子都看不上。等你再干点大事，恐怕把孔子都看扁了呢。

李纨一旁听着，忍不住抗议：你们做事就做事，怎么没完没了地讲起学问了？宝钗一脸严肃：学问就是正事！做事，如果不是学问里找依据，那就俗了。

其实，孔子以后的儒家，对改革一直有微词，更擅长做道德文章，修身养性，培育私德，专心做人，事功能力则相对薄弱。即使言必称仁政的孟子，具体措施也不过是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”，描蓝图画大饼最在行，可操作空间不大。

一心读圣贤书的贾政，也“不惯俗务”，整天跟清客们作风雅之谈。盖省亲别墅，园林室内装修，这些俗务，他不过问。香菱说：连姨老爷都夸宝姑娘有学问哩。宝钗和贾政其实是同路人，只不过她的学问和见识更胜一筹。

对于探春的改革，宝钗还有另一层顾虑：那些搞承包的人有钱赚，其他人岂不眼红？这点子钱，也别看在了眼里，不如年终算账，平分给大家。最后，她召集下人过来，说：我给你们弄了这个额外的收入，大家就要自觉，用心做事啊。

曹公说“时宝钗小惠全大体”，下人们则喜大普奔。

但探春的改革呢？终归是泡汤了。探春的初衷是开源节流，搞承包，增收；宝钗却担心生事端，人为制造差

距。在她眼里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和气第一，就这样把经济改革搞成了人际平衡，把做事搞成了做人。

宝钗的好口碑不是凭空得来的。她事事考虑人心，瞻前顾后，长袖善舞，最怕得罪人。

宝钗一心做人，探春一心做事。探春当代理管家，上任第一件事，就遇到了一件棘手事——赵姨奶的兄弟赵国基死了，按理有一笔抚恤金。到底该给多少？吴新登家的两手一摊假装不知道，而其他媳妇婆子们，都在外面等着看笑话。

这是老员工在使心眼呢。新领导来了，她们要看新领导如何做：糊涂呢，就浑水摸鱼；明白呢，只好老实做人。

李纨说：袭人的妈刚死了，赏了 40 两，那也给赵姨奶 40 两吧。吴新登家的赶紧接了对牌。探春喊住她：先别忙，我要问你，同是姨奶奶，家里的赏多少？外头的赏多少？

赵姨奶是家里的，世代在贾府为奴，而袭人是从外头买来的，待遇不一样。果然，拿来账本一看，赵姨奶应得 20 两。外头的婆子们个个伸舌头，算是服了气。

刚憋住了这头，另一头又闹么蛾子。赵姨奶跑来嚷嚷，指责探春亏待亲妈。探春晓之以理，说这是规矩。赵姨奶不依不饶，说话像扔刀子，句句戳探春的心窝：如今攀上高枝了，就把我们给忘了！

一向霸气的探春，只能气白了脸，无奈地哭。

我为探春点赞！她尊重规则，理性而清醒，这已经是现代的管理精神了。

那么，问题来了：如果是宝钗，会怎样做？

宝钗珍重劳姿，不语亭亭，是打理人际关系的高手。她身上凝聚了中国式的生存智慧，高深莫测，一眼望不到底。而中国式生存智慧，核心就是人脉，是人心的较量与博弈，是谋略。一旦陷入其中，必会化简为繁、满腹心事，像湘云一样踌躇起来。

探春更像谢安，有清明的理性，不凡的气度，英气飒飒，公事私事都处理得很得体。可惜这样的人太少，懂她的人更少。

黛玉看她处理事务谨慎有度，转头对宝玉说：三姑娘真是一个乖人。换了别人早就作威作福了，可她一步也不多

走。这是在夸探春手握权力也不肯滥用。

黛玉是真正的诗人，在乎的是诗和远方，但她懂探春。

王熙凤也懂探春。平儿向她汇报，她连声说：好，好，好一个三姑娘！我就说她很好，果然不错！她有文化，比我更厉害一层了！

但宝钗未必懂。王熙凤私下评宝钗：一向摇头三不知，不干己事不张口。用心理学的术语说，宝钗这个人，心理防御机制很强，对人，她表面热情，骨子里并不信任。

所以，一旦觉察到危险，她首先是自保。

大观园被抄检后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宝钗便来到李纨处，说要搬出去住，理由是母亲身体不好，筹备哥哥的婚事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这无可厚非。只是让人惊讶的是：跟宝钗同住的湘云，居然毫不知情。关键时刻，宝钗真是动如脱兔。

第 76 回，湘云和黛玉中秋联诗，湘云抱怨：可恨宝姐姐，平时说东道热，撇下我们，自己去赏月了。

没办法，一不小心，现实主义就会滑向精致的利己主义。

相比之下，一向给人冷静霸气的探春，却是情有义有担当。

第 74 回，大观园遭遇整风运动，王熙凤和王善保家的，一帮人抄检大观园。怡红院、潇湘馆，一路下来，到了探春处，却见探春率领丫鬟们，早就秉烛开门以待。

她冷笑道：我的丫头是贼，我就是窝主。你们要搜，就搜我的，他们偷的都在我这里藏着呢。便命丫鬟们把自己的箱柜打开，请凤姐检阅。

凤姐赶紧说：妹妹别生气，关上关上，我也是奉命行事啊。

探春接着说：可以搜我的，可别想搜我丫鬟的东西！有什么责任我来担。见探春如此，凤姐赶紧起身告辞。探春说：你可仔细搜了？明天再来，我可不再依了。你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，到明日再说我护着丫头，那可不行！

探春威武！做她的下属何其有幸！可惜，探春的口碑总不如宝钗。做事者失人心，做人者得人心，自古如此。“这样大族人家，若从外头杀来，一时是杀不死，这是古人曾说的‘百足之虫死而不僵’，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，才能一败涂地！”

说出这样沉痛的预言，有这般见识的，必然是探春。

《红楼梦》是本悲哀的书。鲁迅先生说：“悲凉之雾，遍被华林”。悲哀，是对历史，对文化，对人性的多重失望，也因爱和美的最终幻灭。

但曹公依然让探春在大观园，运筹帷幄，兴利除宿弊。在这宏大深远的悲剧里，个体虽然渺小而无助，但是高贵而璀璨。

每一次击破虚空之幕的努力都是不朽的。

热海天气温暖，梅花开得早，当地把每年 1 月 9 日至 3 月 7 日定为梅花节。

在中国，梅花是岁寒三友松竹梅之一，四君子梅兰竹菊之首，地位显赫。

其实，梅花是很普通常见的花。开花早，花期长，香味清逸，颜色繁多，枝干苍劲，傲雪凌霜，生命顽强，乐群共生，只是它的生物特征。但中国从汉、晋、南北朝起，梅花名声日隆。宋代范成大说“梅花韵胜格高”。千百年来，描绘梅花的诗文浩如烟海，文人骚客借花抒情，仁人志士托物言志，赋予它深刻的精神内涵，并将其升华为中华民族的道德、风骨、品格、神韵和价值观念。

日本也有许多梅园，在樱花开放之前，梅花“一树独先天下春”，装点着春寒料峭的列岛，带来春天的喜悦。

据说，在七八世纪时，梅树传入日本，先是在寺院、王公贵族、武士家种植，盛开时，呼朋唤友，欣赏赏首怒放的梅花，举行梅花宴，饮酒赋诗，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。到了中世纪，梅花渐渐传入寻常百姓家，普遍种植，蔚然成风。

在日本最早的诗歌集《万叶集》中，吟咏梅花的诗，有一百多首，而樱花诗，仅有四十首，可见梅花当时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樱花。

但《万叶集》中的咏梅诗，大多为思乡怀友，抒发感怀，并无深刻的思想意义。直到平安中期的学者诗人，被日本人誉为“梅神”的菅原道真的咏梅诗，风骨峭峻，潇洒风流，有几分中国的梅花诗的神韵。

梅花节里的一天，风和日丽，我与妻子去游梅园。

热海梅园在一个山坳里，有梅树三千余株，百年老树 454 棵，几十个品种。进入梅园，满目冰心玉骨，红白粉绿，姹紫嫣红，美不胜收。妻子姓梅，一进梅园，就说真香。我仔细一闻，确实有淡淡幽幽的暗香浮动。我说：这是你本家的芬芳，你自然熟悉敏感。

热海梅园，由日本内务省第一任卫生局长与专斋倡议，由横滨巨商茂木惣兵卫出资，于明治十九（1886）年建成。明治二十四（1891）年，园内立碑记述缘起，碑顶由第一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篆文书写“茂木氏梅园记”，碑文由长与专斋撰写，书法家市川三兼书，官笔刻。原为汉文，但经百余年风雨剥蚀，模糊不清，难以辨认，只好由日文译出：

“温泉对疾病卓有疗效，但并非仅靠温泉中所含盐铁，还需适当运动。若整日闭门不出，即使洗温泉，亦会厌倦疲惫，不能养生。热海群山环绕，东南临海，以温泉而名。人们铲平斜坡，建造房舍，世代居住。此地距东京不远，气候温暖，冬春时节，许多都市人来此沐浴。我初来此时，沿途通山路西行，发现一处山势起伏有致，风景绝佳之地。溪流冲击乱石，

陈喜儒

热海梅园

声如风雨，时分时合，汹涌澎湃，穿芦苇丛，淙淙而下。溪流两侧山丘，松松葱葱。登临小息，环顾四周，旖旎幽静秀雅，乐而忘返。明治十八（1885）年四月，遵岩仓具视大臣之命，建成瞻云馆。我对诸君说：温泉疗效显著，疗养设施完备，但美中不足是，无修身养性之所，故建议在我发现之地造园。神奈川县议员中山保次郎热烈响应，与横滨茂木惣兵卫商议，茂木欣然应允，并与中山氏及当地日吉、小松、露木诸氏协商，决定造园。割草伐木，疏浚浊流，溪水愈加清澈，露出许多妙趣横生的奇石。高处建亭，溪流架桥，依起伏山势，植梅三千株及松、杉、枫、柳等树。至此，设施完备，山水花木，四季俊秀。人们汇集于此，饮酒吟诗，心旷神怡，宠辱皆忘，温泉养生效用，臻于完善。植梅最多，故名茂木氏梅园。茂木氏乃豪商，富甲一方，巨资建园，非为私用，而为大众开放，功德无量。园中花木泉石，巧夺天工，幽雅胜景，可供百姓游览，为国殚精竭虑者，亦可于此休养生息，运筹帷幄，再展鸿猷。

致来园者。是为记。明治二十年内务省卫生局长兼元老院议官四位勋三等长与专斋撰

碑后文字为：“茂木氏兴建园林时，横滨平沼专藏、茂田又七氏出资协助，东京园艺师小川九兵卫监工。原本天赐地利，完工后，更为精彩。不忘兴建者辛劳苦心，特别名于碑后，以传后世。专斋又记”

长与专斋，于天保九（1838）年，生于肥前国彼杵郡大村。他是长与家第五代医生。16 岁时，到大阪绪方洪庵塾学医，与福泽谕吉是挚友。明治元（1868）年，被任命为日本最初的医院长崎精得馆医士。他改革学制，更名为长崎医校，引入西方医学，该校现为长崎医科大学。明治四〇（1871）年，被维新政府调到东京，随使节团访问欧美，归国后被任命为文部省第一任医务局长，内务省第一任卫生局长。他为官清廉，政声甚佳，终生致力于国民健康。

偶翻山田兼次的《热海风土记》，发现在梅园附近，有个“抚松庵”，以山菜料理闻名。庵中有抚松庵记匾额，由长与专斋撰写：“出梅园南口，过小路，有丘陵草庵，乃看园人住所。东北方，可见梅园全景。南临沧海，云雾中，山峦时隐时现。老松如盖，遮檐蔽日，此乃煎茶煮酒绝佳之地，故名抚松庵。”

专斋之子长与善郎，是日本白桦派代表作家，主要作品有《青铜器督》、《竹泽先生其人》、《心灵历程》等。他回忆父亲时，也谈到了梅园与抚松庵：“（父亲）写汉诗，长书法，喜造园林，且乐此不疲。热海梅林，实为父亲所造。父亲提倡讲卫生，鼓励海水浴、温泉浴。温泉易使浴客放荡，为使之有游览场所，兴建了充满自然情趣的公园。他说只有运动，才能使人身心健康。但父亲没钱，故请横滨巨商茂木氏出资，建立梅园。在梅园左侧的山丘上，建了茶室抚松庵。从扇形山谷，可见远处的海。庵内有一棵巨松。父亲从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摘‘抚孤松而盘桓’之句，名其为抚松庵。他手书横额，挂在庵中。有岛武郎对此匾额不饱口。不知那块匾还在不在？也许早已腐朽，破烂不堪了吧？”

我按图索骥，寻觅抚松庵，梦想在那里饮茶食山菜料理，发思古之幽情，可惜竟无人知，怅然而归。



透空镶嵌几何纹方镜（青铜）战国边长 22.5 厘米，上海博物馆藏。战国以后，铜镜装饰出现巨大的飞跃。此镜集各种工艺为一体，采用分铸技术、镶嵌绿松石、嵌红铜丝、错金银等，是目前所见最精美的复合镜。均选自上海博物馆“鸿古余音：早期中国文明展”。



彩绘云鸟纹漆圆盘（木、漆）西汉高 6.3 厘米，直径 26 厘米湖北荆州出土，上海博物馆藏。

画里画外

王 瑛

花开并非只在田野乡间。在太原，牡丹过后芍药来。前赴后继。

父亲好酒。记忆中，像是总有人请他喝酒。偶尔喝至兴起，提笔作画。最喜欢画花鸟虫鱼。父亲的中山装口袋总是鼓鼓囊囊，我躲在一边看。他掏出两颗山楂果，看了看，又放回去。有一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葵花瓜子，哗一下往桌上撒开，画起来。

我无数次央求父亲，教我好吗？他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我画，你看！”父亲站着画花，画草虫则要坐下。用生纸。第一遍勾线，笔量淡，他把画笔往地上甩两下说：“笔头蘸水越少越好。”我默默地看。父亲勾线极快。很细很淡。接着施色。用一只小号羊毫，一手持笔，一手捏块叠成豆干大小的宣纸，施一下色，马上用这纸块轻按一下。颜色不会晕开。施色连施好几遍，一只蚂蚱跃然纸上，最后用深一点的颜色勾出轮廓。蚂蚱须最后画，根部朝外，轻轻一挑，父亲自己也得意起来，他抬头扫我一眼说：“看看！这线！”我呆站不动，心想，看什么？怎么看？

父亲有时心情好，让我帮他磨墨。我磨一阵，他用笔试一下说：“不行！”我赶紧再磨。偶尔也研朱砂。水兑进去，不停地研，不敢偷懒。父亲说：“看着点，再研就坏了！”怎么个坏法？他也不讲。只见他把胶兑一点进去，笔在朱砂里蘸一蘸，嗯一声说，“可以！”父亲用朱砂画雁来红，我奶奶叫“老来

俏”，画完把纸往上反扣过来，说这样颜色才不会往后跑。我不明所以，也不敢问。问了他也不说。有时候画已经干了，父亲在纸的背后，用笔小心地点一下，又点一下——补朱砂。父亲的雁来红颜色真好看，并非大片大片拥挤，通透而清丽。“画那满干啥？”父亲说，“喘不上来气！”他把叶子跟叶子间的空隙叫“气眼”。画桃子，先在纸的背后用藤黄与赭石调好的颜色打底，然后用胭脂从正面开始画，左一笔，右两笔，再来一下。好了。三笔连成的桃子，饱满而鲜活。父亲像是从来不画素描，我不敢问其究竟。他没事时最喜欢画葫芦，从屁股开始。父亲画蝴蝶从不画绿蝴蝶，用赭石画麦秆儿色的蝴蝶。父亲说，“绿蝴蝶红肚皮，好看？”我奶奶的鼻烟壶上有这种蝴蝶。记忆中，父亲书房的画案上，放着一个火柴盒，上面用大头针扎着一只蝴蝶，放了许多年。这蝴蝶在最后一次搬家时不知所踪。父亲画画并不急于动手，要先看。看纸。把白纸悬挂在立柜旁边的墙

上——专门钉了两根铁丝——盯住看，一看大半天。我躲在门背后，心想，他在看什么？父亲看着白纸，嘴唇一张一翕，屋子里走来走去。多年后有一次聊到对此景，父亲说，“要能把画先在纸上看出来才行！”有次画完一只老虎，父亲把它挂到铁丝上，继续盯着看。这又在看啥？“平放着看，是虎”，父亲瞪我一眼说，“挂起来再瞧瞧，可能变成了猫！”

儿时记忆中，父亲画国画，我常常帮忙研墨，稍大点开始裁纸，偶尔学裁颜色。父亲最喜欢的画家是齐白石，心情好时跟我闲聊，有一句没一句，手里一瓶二锅头。父亲喝酒从来不用酒杯，也无需任何下酒小菜，酒瓶举起来咕咚一口，说，“吴昌硕的画，色调比较灰暗，任伯年画好，但意境要上了些年纪的人，才看得出”，又咕咚一口，“徐渭琴棋书画样样造诣均深，可惜是个疯子”，说完看我一眼，“女孩子不要看，容易学坏！”我听得一头雾水，父亲再次开了口，“八大山人的鸟鸟说

叫出天价，可总那么皱眉瞪眼”，他的眼神暗淡下来，沉默一阵，笑着摇摇头说，“我喜欢画画一辈子，到后落了个啥？”

每到紫藤花开季节，父亲要画一回。画老藤用一种笔，画紫藤花又是另外一种。父亲用大笔画很细很细的线，很小很小的叶片。落款却用小衣冠。小笔写大字，没写两三个，墨已经没了。我在边上加紧磨。蘸墨继续写——“寂寞开无主”。父亲的题字渐渐浓淡，再淡，直至枯干。父亲呵成，苍劲而有力。父亲画花儿之外，偶尔兴致好，会拉两段京胡自娱自乐，可惜天生五音不全，还顶唱几句，我奶奶在屋里喊，“欢欢喜喜闭嘴，听得俺心里抓挠活受罪嘛！”他不拉了，忽然扭头看看我说，“有些地方必须交待清楚，这叶子到底是这根上的？还是边上一根？”我一愣，他又说，“画画儿写字，不要复笔，不要重复勾描涂抹，一描就毁了！”父亲单位每年正月十五赛花灯，他负责给灯笼上作画题诗，画得很认真很仔细。灯

挂出去，有人反馈说不好，父亲回家后大发雷霆，“司马懿破八卦阵，他们懂个啥？”

父亲始终未曾答应教我画画儿，他从不解释什么理论。成人后有次我陪他喝酒，酒过三巡心境大好，他莫名其妙来了一句，“白石老人也从不会素描！”我奶奶喜欢把紫藤花上的蜜蜂叫“眼睛”。画紫藤时，父亲口里不断地念叨，“眼睛在哪？在哪？”父亲习惯把蚂蚱蝗螂蝴蝶等通通叫做“眼睛”，画两笔说一句，“‘眼睛’咋能画在这里？瞎胡闹！”记忆中，父亲的衣服口袋里永远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有次他把手绢，掏出一只未成熟的硬柿子，半黄半绿，微微透明，很好看，他把柿子抹了又抹，我眉头一皱说，能吃？这种柿子不预先处理，太原人叫“搅一搅”，入口脆硬苦涩。他把柿子摆在桌上，盯住看半天，又放回去。我轻轻地舒了口气，父亲悠悠地说，“学画画儿，首先要学会磨墨，兑色，裁纸，都有窍门，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……”

我大学毕业后常年在在外地，但每次回太原，还是喜欢看父亲画画儿。仿佛回到童年，帮他磨墨裁纸兑颜色。此时的父亲已少作画，用墨的时候也总是说一句，“这回浓淡正合适！”有一次，父亲忽然很高兴，说花鸟虫鱼终于可以重登大雅之堂。我含糊支应，敷衍了事，如今想想十分后悔——永远也不可能真相大白了。

「文汇报」 微信二维码